

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四川作战”计划的破产

胡德坤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曾策划过鲜为人知的“四川作战”计划。该计划的出台是日本深陷于中日战争持久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困境时,日本当局不得已而采取的“赌博行为”、“穷极之策”。“四川作战”计划的实施之所以一波三折,最终胎死腹中,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是最重要的因素。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四川作战计划 破产

一

“四川作战”计划是日本当局企图从中国持久抗战泥潭中挣扎脱身的冒险之举、穷极之策。

北进、南进政策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外侵略扩张的主要国策,是日本世界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所谓北进,是指日本通过中国向苏联远东地区扩张,主要对手是苏联。所谓南进,是指日本通过中国向南洋一带扩张,主要对手是美英等国。但日本要实施北进、南进战略必须先占领中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亚,甚或两处都打。欧洲战争一起来,它就会干这一手”。^①这就是说,征服中国是日本实施北进、南进政策的基点。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速战速决,在短时间内灭中国。但中国的顽强抵抗打破了日本的如意算盘,日本陷入中日持久战泥潭而难以自拔。尤其是日本陆军主力投入了中国战场,使日本当局无力南进进攻美英,北进、南进政策迟迟不能提上日程。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英法随即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为日本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提供了契机。但中国的持久抗战拖住了日本的后腿,使其无法迈

出南进的步伐。面对欧战爆发,日本阿部信行内阁束手无策,于9月4日发表声明,声称“现今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不介入欧战,专注于为解决中国事变而迈进”。^②为了能尽快将南进政策提上日程,日本当局集中力量进行对华战争,以便迅速结束中日战争。

1940年5、6月份,德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西北欧,击败了英法军队,法国败降。德国在欧洲的扩张牵制了美英苏等世界大国,德国在欧洲的胜利也大大刺激了日本南进的欲望,认为是千载一遇的南进良机,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要加快南进的步伐,跟上德国的侵略速度,乘英法之危,在南洋趁火打劫。7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适应世界形势变化的时局处理要纲》中指出,“同世界形势的变化相对应,改善内外形势,在促进中国事变解决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关于中国事变的处理,集中战略、战略的综合力量,特别是断绝第三国的援蒋行为等一切手段,尽快使重庆政权屈服”;“在中国事变已解决的情况下,只要内外形势允许,就捕捉良机行使武力,解决南方问题”;“在中国事变未能解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76页。

^②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9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2页。

决的情况下,如果内外形势特别有利,也可以行使武力解决南方问题。”^①这就正式确定了南进政策。

为了准备南进,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措施。1940年9月,日本与德意结成了军事同盟,明确地把东亚、包括南洋地区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把美英作为主要敌人,其目的是利用三国同盟对美英施加压力,使其放弃援华政策。日本当局在《关于强化日德意轴心的文件》中明确写到:“为了解决中国事变,希望德意尽可能地在政治、经济方面给予协助。”^②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缔结中立条约,一方面是希望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想削弱苏联的对华援助和支持。10月3日,日本外务省在《日苏国交调整要纲案》中,明确要求苏联承认伪满洲国,放弃援蒋政策,抑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行动等。^③1941年1月,日本与美国重开谈判,企图利用日美谈判来达到孤立中国的目的。这些外交措施的一个共同点是:争取解决中国问题的有利形势,甩掉南进包袱。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给日本提供了向北进攻苏联的良机。但日本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无力北进。正如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所言,“现在日本将重兵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不可能”。陆相东条英机也指出,“中国事变必须继续解决”。7月2日,在日本御前会议上,杉山元又进一步指出:“对德苏战争,日本当然应该根据三国同盟精神采取行动,但帝国目前正忙于处理中国事变,我觉得以暂不介入为宜。”^④在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之后,会议赞同陆军的主张,认为北进问题只有等到苏联败局已定,瓜熟蒂落,才能趁火打劫,不战而胜。因此,会议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要纲》决定:“不管世界形势如何演变,帝国均将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方针”,“向处理中国事变的目标前进,并为确立自存自卫基础,跨出南进步伐。”为此,“不辞对美英一战”。南进也是为了“进一步从南方区域增加压力,促进蒋介石政权的屈服”。如果说1940年夏到1941年夏,日本对华政策是为了准备南进,那么,这次御前会议确立南进方针后,日本对华政策便是为了推进南进政策的实施。此时,日本当局感到,要想先解决中国问题再南进已毫无希望了,只有先南进,再利用南进的胜利,使国民政府进一步孤立,才能迫使其屈服。但日本中国派遣军总

司令官畑俊六大将认为,中日战争已经5年,“仅仅一个中国,日本的力量就很勉强”,“现又两面作战,情况将会越来越困难”。^⑤1941年上半年,武汉地区日军第十一军进行了湖北襄阳作战、江西锦江作战,华北日军在晋东南进行了中原会战等。由于日军主要兵力用于“治安战”,因而,这些小规模的“短促作战”,都以损兵折将而告终。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便成为日本南进最大的后顾之忧。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兵力为51个师团,具体分布情况是:日本本土4(另有混成旅团11)、朝鲜2、中国35(其中东北地区13,另有混成旅团24;其他地区22,另有混成旅团20)、太平洋战场10(另有混成旅团4)^⑥。在太平洋战场的日本陆军仅10个师团,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19.6%,而在中国战场的日本陆军有35个师团,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68.6%,这就表明,日本陆军主力仍在中国战场作战。1941年12月3日,日本大本营在《大陆命第575号》命令中,规定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总目标是,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总任务是在华北、京沪杭地区的占领区加强“治安战”,“迅速恢复治安”,对国民政府“加强封锁,摧毁其抗战企图”,“确保重要资源地区,努力培养我战力”,“实施对华谋略,促使抗日势力的衰亡”,在武汉地区发动进攻作战,“努力摧毁敌人的抗战力”,在广州地区扩大对沿海的占领。^⑦根据这一命令,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不仅要在各方面自给,而且还要从占领区攫取更多的物资,支援太平洋战场。1942年3月19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在上奏中提出,“在形势许可的情况下,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断然为解决中国事变而迈进,以图迅速解决之。”他提议,“在

① [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册,《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450页。

② [日]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5·三国同盟、日苏中立条约》,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267页。

③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东京原书房1982年版,第82—84页。

④ [日]实松让:《现代史资料35·太平洋战争2》,东京美铃书房1978年版,第121—122页。

⑤ [日]《战史丛书9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第442页。

⑥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94—195页。

⑦ [日]《战史丛书9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第466—477页。

中国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作战目的是：或能歼灭敌之中央军，或能攻占对重庆政府构成直接威胁的战略要地，或使重庆政府进一步丧失统制力，策动其各军分裂、崩溃”。他强调，对日本在华占领区进行“清乡工作”，“根据清乡工作的扩展，彻底提高占领区的治安”。为此，要从其他地方抽出若干兵团，同在华日军一起进行大规模作战，歼灭国民党中央军。

4月6日，杉山元在上海向畑俊六做了进一步说明。杉山元指示说，“在目前时局下，中国事变的处理着眼于歼灭敌军，摧毁敌抗战力，……彻底肃正治安，进而通过政略、谋略的运用，加强经济压迫，消磨敌之抗战意志。尤其是在切断缅甸援华道路后，击溃敌骨干兵团，其意义极为重大。”^①他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就这次作战进行研究。5月16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边盛武中将到南京向日本中国派遣军传达日本大本营的意图。田边盛武指出，日本在南方的作战已大致告一段落，要利用南方作战的成果，努力解决中国问题。为此，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研讨“西安作战”（简称50号作战）计划和“四川作战”（简称51号作战）计划，争取在1942年9月以后发动“西安作战”，作战目的是：“歼灭西安地区正面之敌，攻占西安及宝鸡附近要地，并努力切断西北通道，强化对重庆政府的压迫态势，以支持政略谋略的推进。”1943年春季以后发动“四川作战”，作战目的是：“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战果，伺机对四川平原实施进攻作战，歼灭该方面中国抗战军队的主力，攻占四川平原要地，以政略与谋略相结合，使重庆政府屈服、崩溃或分裂。”^②于是，“四川作战”计划的制订便正式提上了日程。

二

1942年5月2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西安作战”计划，准备集中7个师团、2个旅团的兵力进行“西安作战”。对“西安作战”计划，日本华北方面军忧虑重重，内部发生激烈争论，不少人认为不宜进行“西安作战”，其理由是：“日本华北方面军正在全力剿共，以期迅速恢复治安，但如能在增强兵力的有利情况下，也想歼灭西安方面胡宗南的重庆嫡系第八战区军队。可是，当前第八战区在与我军对峙的同时，也与延安的中共军队对峙，只进攻西安反而对日本在华北的主要敌人中共军队有利，因而下一步要考虑消灭延安”，“日

本同重庆方面虽一时相争，却有共存的性质。但日本同中共势力之间是不容许共存的”，“日本华北方面军的真实意图在于消灭延安。”^③即是说，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其主要敌人是中共军队，更重视的是“延安作战”，而不是“西安作战”。在日本参谋本部也有不少人认为“西安作战”持反对意见，认为如果只进行“西安作战”而不进行“四川作战”，对解决中国问题效果不大。于是，到6月，“西安作战”便合并到“四川作战”计划中，成为“四川作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此时，日本中国派遣军对“四川作战”寄予了厚望。

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失利，日本大本营估计，1943年下半年以后，美英的军事力量将逐渐增强。为此，必须在此前主动发动攻势。在中国战场，日本参谋本部加紧制订“四川作战”计划，6月末，制订出“四川作战”（时称51号作战，后改称5号作战）的基本方案。该方案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出动16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2个航空师团的庞大兵力，分别从西安、武汉出发，南北两路夹击四川，“歼灭敌中央军主力，攻占重庆，并占领四川省”。^④对这一方案，日本陆海軍中央部、日本中国派遣军经过多方研讨，深感困难重重，但为了取得战争主动权，也不愿放弃冒险一试的机会。8月25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目前形势下的陆军作战准备》中指出，拟于1943年春在中国战场出动16个多师团的兵力发动“四川作战”（即5号作战），“这次作战的目的，是歼灭敌中央军主力，并攻占四川省的要地，摧毁敌抗战根据地，促进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为了进行“四川作战”，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将中国（不含东北地区）的日本作战兵力从61万人增加到97万人，即增加36万人。其中，从日本本土抽调12万人，从中国东北抽调18万人，从太平洋战场抽调6万人。日本中国派遣军新组建第五方面军，下辖第一、第七、第二十八军共11个多师团的兵力，其

①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5·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东京朝云新闻社1972年版，第15—16页。

② [日]《战史丛书55·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第24—26页。

③ [日]《战史丛书55·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第110—112页。

④ [日]《战史丛书55·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第42—45页。

中,第一、第七军担任沿山西潼关、陕西汉中、四川广元一线,进攻成都,占领四川;日军第二十八军沿河南郑州、湖北襄樊一线,从重庆北部进攻重庆;武汉地区的日军第十一军沿湖北宜昌、四川万县一线,与日军第二十八军相配合,从东面进攻重庆。作战时间预定为1943年春季以后。^①9月4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同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河边进行了恳谈,传达了“四川作战”计划。由于日本陆军主力长期对华作战,仍只能维持战略相持局面,现在岂能以重兵进攻四川?长期在中国战场指挥作战的河边对“四川作战”深表疑虑,他反问到,“大本营对5号作战使用兵力预测的基础如何?”“同进攻武汉时相比使用更大规模的兵力进攻四川可能吗?其结果只是占领点和线吧!”但日本大本营仍坚持原案。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新一中将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作为第一部长,决心排除万难实施5号作战。那是由于我认为在战争最后阶段决定性的力量仍是控制中国大陆,而且立足于必须坚决防止中国大陆成为美国空军基地。同时,考虑到控制中国大陆对印度和西亚诸国带来影响,这是在促进战争结束方面目前的重要方策。”^②9月6日,河边返回南京向畑俊六做了汇报,其要点是:一、美国战力日益增强,而日本军需生产供不应求。为确保南方作战成果,要先瓦解英国,再使美国丧失战斗意志,争取在西亚与德意会师,对苏联采取既定方针,期待在今明年内结束战争。在此期间,为瓦解重庆政权而发动进攻,时间视形势而定,但要着手准备。二、进攻四川的作战完全是一种赌博行为,以此打开局面是一种悲壮的决心。因为日本的国力关系到同美作战问题,所以虽不允许将宝贵的军用物资用于对重庆作战,但作为穷极之策,陆军中央同意进攻四川。^③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召开军事会议,要求迅速准备“5号作战”演习。

9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瓜达尔康纳尔岛争夺战中遭到重创,导致太平洋战场战况开始向不利于日本方面转化,使日本大本营对“四川作战”计划产生了怀疑。9月下旬,日本参谋本部通知日本中国派遣军,“四川作战”延期到1943年7月。11月,日本在瓜岛战役中再遭重创,形势对日本更加不利,不得不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到太平洋战场。日本大本营认为,美国暂时难以从中

国大陆发动大规模反攻,日本只有竭尽全力在西南太平洋作战以打开局面,为此,须中止“四川作战”准备。^④11月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作战课长宫野大佐就“四川作战”计划到日本参谋本部进行了恳谈。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边盛武中将托宫野大佐转告通知日本中国派遣军:按照参谋本部的意见,“关于5号作战问题,经过各种研究之后,由于全盘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有关船舶及国家物资动员(预计可获得的军需品数量锐减)的问题,判断在1943年实施此作战至为困难,此问题当于最近研究后另行指示”,“当前,日本全军的状况是,不仅不能向中国增加兵力,而且还不得不考虑将来要从中国向其他方面转用部分兵力和物资。”^⑤12月10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在向天皇上奏中指出,“根据全面情况,当前不仅不能向中国增加兵力和物资,反而要抽出一部分兵团、部队转用于南太平洋及其他方面。当前,应在上述范围内,根据现在的任务进行作战,尤其要努力提高占领区的治安。”同日,日本参谋本部在给日本中国派遣军的《大陆指第1367号》命令中指出,停止“四川作战”准备。据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在1942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大本营判断,凭借大东亚战争初战成果,能得以完成不败的态势,企图进入印度洋同德意联络。原来判断美国从明年下半年反攻,但却意外地提早反攻,不仅在所罗门方面,最近在新几内亚、帝汶方面也企图反攻。如果放弃所罗门,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也就失去了根据地而后退,不仅不能完成不败的态势,而且必定处于守势。可以预料,美军将在婆罗洲、菲律宾方面反攻,日本将尽全力确保所罗门、帝汶一线”,“由于明年全年对中国方面不能补充兵力、资材和补给,明年在中国的进攻作战一律中止”,“形势如此急剧变化,极不愉快,但从全

^① [日]《战史丛书55·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第51—57页。

^②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63·大本营陆军部》,东京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79页。

^③ [日]《战史丛书55·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第65—67页。

^④ [日]《战史丛书63·大本营陆军部》,第420页。

^⑤ [日]《战史丛书55·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第85页。

盘形势来看,别无良策。”^①从畑俊六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中止“四川作战”计划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持久抗战,日本陆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进退两难,仅靠日本中国派遣军则无力发动“四川作战”,“四川作战”计划便被迫搁置。二是太平洋战场正在发生战略转折,从1942年6月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因战败而丧失制海权,到12月瓜岛争夺战屡屡失利,日本正在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将面对美国在西南太平洋到东南亚一线的反攻,这比日本大本营的预期要早得多,打乱了日本企图利用太平洋战争初战成果,在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以结束中日战争的战略计划,使日本无力实施“四川作战”计划。

1943年6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转入守势,估计美军即将开始发动大规模反攻,便企图在美军攻势到来之前建立“不败态势”。其中,关于在中国战场的作战,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在研讨时出现了严重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日本面临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应重在研究在太平洋的防卫,即使想解决中国问题也不会有成效;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在中国进行“四川作战”,因为“不能形成自强必胜的态势,就是战败的前提”,还是以进行“四川作战”为好,因为重要的是目标明确,认清能否确实使重庆脱离美英,蒋介石虽不致于举手投降,但其部下将领四分五裂,这就意味着美国将无法利用中国。讨论的最后结论是:“对华作战不宜操之过急,必须避免鸡飞蛋打。”^②日本参谋本部深知要在中国进行“四川作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只能伺机而动,不敢贸然行动。

1945年初,日本中国派遣军取得“一号作战”(中国称“豫湘桂战役”)胜利后,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再次提出“四川作战”计划。1月1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在《关于今后作战指导的意见》中指出,如果进行“四川作战”,蒋介石政权将极为动摇,现在正是对蒋介石政府军各个击破的最后机会。因为估计美军将于今年中期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那时,蒋介石政府亦恢复了战斗力,将与美军相呼应在中国西部发动攻势,使日本中国派遣军处于东西两线夹击之中。为避免东西两面作战,同时也为了将美军吸引到中国大陆,有利于日本本土决战,现在应乘胜发动“四川作战”,“攻占四川省要地,防止重庆军队的总反攻于未然,同时

也使重庆政权崩溃”。^③1月5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中将到东京向大本营建议,“估计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进攻的时间约在今年中期以后,要在美军进攻之前进攻四川,攻占重庆”。日本中国派遣军认为,抵抗从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的美军进攻较之进攻四川要困难得多,因而主张先进行四川作战。日本参谋本部虽然认为日本中国派遣军的分析判断有道理,但此时,日军在菲律宾战败,估计美军下一步将在中国沿海登陆,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首先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做好防御准备。^④日本大本营紧急研讨新的作战计划,提出了两种作战方案:第一种方案是继续努力进行决战,消耗盟军战力,同时使“日、满、华”地区要塞化;第二种方案是放弃目前的决战,立即退守重要地区,全力进行长期战争。经过辩论,多数人认为,不进行决战就不可能进行长期战争。于是日本大本营便采纳了第一种方案,提出了《以1945年中期为目标的战争指导草案》,决定“帝国依然继续进行决战,争取战局的好转,并迅速确立以日满华为基础的积极防卫态势,坚决实现长期持久战争。”^⑤1月20日,日本大本营制订《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确定新的作战方针:以粉碎美军的攻势为作战重点,确保和维持与战争有关的重要地区,挫败盟军的战斗意志,达到战争的目的。作战计划是:一方面加强日本南部诸岛和中国东南沿海兵力,阻止美军进攻;另一方面加强日本本土防卫,建立以日本本土为中心的防御体系。这表明,日本大本营作战重点是阻止美军进攻。1月22日,日本大本营向日本中国派遣军下达《大陆命第1228号》和《大陆指第2363号》命令指出,“大本营的意图是击退正在反攻的敌人,尤其是美军,确保以皇土为核心的国防要地,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此后,日本处在中美苏盟国的包围之中,四面楚歌,已无还手之力,至此,日本“四川作战”

① [日]伊藤隆、照泽康孝:《现代史资料续4·陆军·畑俊六日记》,东京美铃书房1983年版,第384页。

②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66·大本营陆军部6》,东京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644—645页。

③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42·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237—242页。

④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1·大本营陆军部9》,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539—540页。

⑤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733页。

计划便寿终正寝。

纵观日本“四川作战”计划的酝酿、提出和破产的全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四川作战”计划制订的目的,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是为了利用太平洋战争的初战胜利成果,攻入中国大后方,迫使中国屈服,以结束中日战争,将中国变成日本同美国决战的后方基地。但日本实施“四川作战”计划,仅靠在华日军的兵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其他方抽调大量陆军,这就增加了日本实施“四川作战”计划的难度。当日本在瓜岛战役中失利,在太平洋战场转入防御,不得不退守“绝对国防圈”时,日本对“四川作战”计划逐渐丧失了信心,最终放弃了日本“四川作战”计划。由此观之,日本“四川作战”计划破产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的结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在太平洋战场仅10个师团,而在中国战场达35个师团,如果发动“四川作战”,日

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兵力本来就不敷使用,还要抽调6万兵力到中国战场,实际上完全不可能。1942年12月,当日本在瓜达尔康纳尔岛作战中失利时,日本不仅不能向中国增加兵力,反而决定从中国抽出一部分兵力转用于南太平洋及其他方面,这就使日本“四川作战”计划未及实施,便胎死腹中。二是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作战,使日本顾此失彼。历史证明,打败日本法西斯是中美英苏等盟国合力打击的结果。日本“四川作战”计划的破产,是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互相支持,互相援助的结果,是战时中美合作的典型一例。

[胡德坤: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邮编:430072]
[责任编辑:蒋梅]

(上接第96页)从监察院提案弹劾到政务官惩戒会决议被否,王正廷被弹劾案历时两年4个月,此案的不了了之,既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出意料之外,是因为在法理上,王正廷的被付惩戒决定是在经历了全部合法程序后,由党政两方面的政务官惩戒机构所共同审核议决而形成的,然其最后却是与前决议截然相反的结果,如从国民党党国体制下权力行使的规则角度来考量,这样的结局显然是十分“出格”的,甚至可被视为对国民党党国运作机制的一个嘲弄。然而,此结局其实又在情理之中,因为前述种种法规和章程都只是国民党“党治”体制权力结构的外化表现。由于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政权乃一以“党治”名义

行之的独裁政体,在这一政体中党权与“领袖权”被混为一体,在“朕即党”的“人治”观念下,权力制衡只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影响,通行的主要是隐伏于制度层面下权力运作的“人治”规则。而起最后作用的,不仅不是监察部门,甚至也不在党的中枢机构一中政会、中监会、抑或中常会,而在于凌驾于所有这些部门之上却真正握有实权的领袖个人。

[申晓云: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
研究中心教授
邮编:210097]
[责任编辑:戚如高]